4. 巴克禮《補編》的意義

巴克禮在《廈英大辭典補編》前言中，盛讚杜嘉德1873年所出版的《廈英大辭典》是一部「完整且精確的學術著作。半世紀以來已嘉惠學此語言的所有學生」。

但是歷經五十年之後，「中國發生了鉅變，西方文明廣受歡迎，在思想、行爲的各方面，各種新觀念瀰漫民心。這些新觀念產生了新詞彙，豐富和拓展了語言。」於是杜典遂越來越令人感到詞彙不夠，不足以指導學生了。

在出版《補編》（1923）的十年前，即1913年，台廈地區基督教傳教士請巴克禮重譯《新約》的同時，也請巴克禮替杜典作《補編》。

巴克禮舉例說明《補編》如何補充杜典說：「『校』hau 現在是很常用的字，卻不見於杜典；五十年前『會』hoe 是一種禁忌，會被當局所疑，在杜典中只收二十個詞，但在《補編》中這樣的詞卻佔了一頁。『電』tiēn字在《補編》中超過一百詞，而在杜典中卻只有二個，而且與電氣無關。」

杜嘉德著《廈英大辭典》（1873）時，電學尚在萌芽，電燈尚未發明。1908年巴克禮返歐，經過巴黎時才第一次看到電燈，1923年出版《補編》時，台灣的電氣化已相當普遍了。杜典中「電」字只收「電母」、「雷公電母」兩個古詞條。巴典中不收這兩個古詞條，卻收了113個大部份與電氣有關的新名詞，如電報、電信、電匯、電報爲替……電話、自動電話……電燈、電火、

電柱……電塗、電池……電金……絕大多數是來自日語的新名詞，其中大部份被現代中文吸收，現代台語仍使用，有些中文未吸收的，如電報爲替（電匯）、電話交換手（電話接線生）等即隨著日本時代結束而廢用，有些台灣獨特的俗語如稱電報爲「電線批」，打無線電報叫「扑飛電」，亦流失，仍然保存的非中文辭彙僅屬少數。

完整的白話辭典是民間文化的紀錄，由杜典到巴典及《台日大辭典》以至今日尚待編輯的台語現代辭典可以說代表著閩南語發展爲現代台語的各代文化史冊。從這個觀點來看巴典，便知道巴克禮在歷史上佔著多麼崇高的地位。比起只爲漢字注音的偕叡理《中西字典》、甘爲霖《廈門音新字典》，自然是不同凡響了。

杜典所不收的字，巴典增補的在字頭上加*號。那些加了*號的字，不全是杜嘉德疏忽未收，大部份是當時口語所不用，如價值的「價」kà；階級的「階」kai；諷刺的「諷」hóng；俘虜的「俘」hu，芎蕉飴的「飴」î；要求的「要」iau；擁護人權的「擁」íong……這些漢字都原有閩南語讀音，但不用於白話，所以杜典不收，近代以來受到日語、中文的影響，口語採用做爲新詞素，巴典才收入，另外有些新字，如碘質的「碘」tién；「鈤」（即今矽字）sék；「鏻」（今作鉻）lō；「燐」lîn……當然杜典不可能收入，巴典作了增補。總而言之，巴典反映了二〇年代的閩南語，尤其是當時台灣新文化的詞彙系統。

儘管如此，巴典對於一些已經過時的詞彙，如和前清科舉制度有關的詞彙仍然儘量補充。他認爲這類詞彙雖然已經沒有實用

的價值，但仍然是語言的一部份，可以做爲過去事物的一種留念。

杜典和巴典都是一種口語詞典，他們製作的目的是蒐集口語中出現的詞素，而以例舉辭彙的方式讓使用者了解詞素的意義。因此辭彙組成的例句、格言、俚諺，巴典和杜典都很少收入。巴克禮希望編一本"Dictionary of Phrase and Fable"（片語及寓言辭典）但沒有實現。

巴克禮曾建議成立一個委員會，成員們分別注意各個領域，如醫學、神學、科學、哲學或日常生活的語彙，其中一人擔任總校對，每一個人身邊都要有個中國學者當顧問，編纂完整的閩南語辭典。然而以教會的力量，顯然不可能做到。事實上，當巴克禮做此建議的同時，台灣總督府已經運用政府的力量進行了很久，巴典出版之後，一部偉大的《台日大辭典》再過十年(1932-33)就出版了。

巴克禮在序中提到兩位幫助編輯《補編》的人。一位是梅監霧（Rev. Camipbell N. Moody of Shoka），台灣中部長老教會設教功臣，他曾把四百餘頁的辭典手稿交給巴克禮使用；一位是剛由日本留學歸來的楊士養，他懂中文、日文、英文，也許他才是巴克禮最得力的助手。

註譯：

①據井川（1936）〈鄉國に於けるバアクレイ博士〉，P.28。巴克禮所發表的論文題目是〈電導體的誘電量比及其相應於溫度量的變化〉。

②參照昭和9年8月31日ジァパンタイムス輕井澤通信〈バアクレイ博士と乃木將軍〉，巴克禮手記〈乃木將軍の台南入城〉，收入井川（1936）P.129-140。

③參見賴永祥〈巴克禮增補杜辭典〉，1988. 8.28，《台灣教會公報》1904期。收入賴永祥《教會史話》第一輯P.90。

④參見巴克禮〈八十六歲ぺ新舊約聖書翻譯〉，據井川（1936）日譯，P.76-85。

⑤萬榮華〈十七歲で獻身した博士〉，據井川（1936）P.166轉譯。

⑥"Barklay of Formosa"P.67。引自賴永祥（1990）P.59。

⑦見《台灣府城教會報》創刊詞，1885年 7月第一期。

⑧昭和10年12月萬榮華演講〈十七歲で獻身した博士〉，井川（1936）P.166。

⑨引自國府種武〈トマス・バアクレイ師と國語教授〉，原載《台灣教育》401號，收入井川（1936）P.64-74。

⑩參見村上嘉英〈日本人の台灣における閩南語研究〉，P.72。1966《日本文化》45號。

⑪同⑨。P.72。

⑫同⑨。

⑬見拙著〈日據時代的台語辭書編纂〉，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五冊題解第九頁。

⑭以上有關師萊格、佛蘭根、赫萊斯等人編輯字典的過程參見施萊格《荷華文語類參》的序言（第三冊）。關於當時的歷史背景可參見包樂史的《中荷交往史》，茲將有關三人的傳記資料（P. 128-132）引述如下，敬請參考：

1853年，荷印總督戴瑪爾・范・特威思特（A. J. Duymaer van Twist）向荷蘭殖民大臣巴胡德（C. F. Pahud）提出申請，要求政府考慮培養幾位荷蘭人成爲中文通事。他認爲，〝既然巴城政府已經知道荷印華人的不軌行爲〞，那麼對中文通事的需求是迫在眉睫。當巴胡德大臣著手調查于萊頓建立這種一個培訓中心的可能性時，驚異得知住在萊頓的荷印政府的日文翻譯霍夫曼（J. J. Hoffmann）已經卓有成效地培養著一位十三歲的荷蘭少年施萊格（Gustave Schlegel,一譯施力赫），他給這位荷蘭少年講授古代漢與語閱讀課已有一、二年之久。霍夫曼堅信，通過繼續學習，到施萊格成年時，他將成爲一名精通中國語言文字的學者。因此，政府正式要求他繼續講授這門課程，并增加兩、三名荷蘭學生。不久后，施萊格的兩位同齡人弗蘭根(J. J. C. Franccken）和斯哈爾遮（ M. Schaalje）及軍隊藥劑師德・赫萊斯（de Grijs）也開始學習中文課程。由于缺乏高質量的詞典和語法書籍，學習中文相當吃力。1857年，霍夫曼宣稱，現在應該送他們到廈門去進一步深造了，他們在廈門可學

好荷印地區大部分華人使用的閩南方言的口語。1862年，也即在中國留學四年之后，這些學生的學習始告成功，他們帶著學識與經驗前往巴達維亞，擔任通事。

施萊格并未辜負其恩師霍夫曼的厚望。他出版了幾部卓越的研究著作，其中，《天地會：中國與荷屬東印度的秘密會社》（Thian Ti Hwui, the Hung - League or Heaven - Earth - League, a Secret Society with the Chinese in China and India）一書最爲著名。這本開拓性的著作于1866年初版以後，又多次再版。此書披露和分析華人秘密會社的禮儀制度，因此，荷印當局能採取相應措施對付華人黑社會。1872年，施萊格因病假回到荷蘭後，立刻拜訪其恩師霍夫曼，談論關於中文教育問題。霍夫曼此時已擔任日本語言文學教授，他勸施萊格向荷蘭殖民部建議，改善華文通事的培養教育條件。他認爲施萊格可以接替他講授中文課程。在一份〝關于急需在荷蘭建立中文學校的報告〞中，施萊格强調了建立這個機構的重要性。所需要的漢學教授不僅應培養翻譯人才，而且要爲未來的東印度官員講授關于華人風俗習慣的基礎課程。他認爲，〝荷印華人之所以發生多次暴力反抗和騷動，僅應歸咎于荷印官員不了解他們的民族性格〞他也强調必須著手編輯高質量的荷漢和漢荷辭典各一本。已故的學者弗蘭根所編的漢荷辭典的手稿已經完成了，施萊格也順便提及他已〝耗時十五年編輯的荷漢辭典也已大部分脫稿。〞在殖民部的資助下，施萊格得以將這本書付梓，由擁有歐洲第一套能印漢字的設備的萊頓布理爾（Brill）←出版

社出版。施萊格在報告中宣：〝既然荷蘭人以前認爲需要設置一名日文教授，現在就更應設置一名漢學教授。荷蘭與日本僅有貿易方面的關系，而荷蘭的殖民地卻生活著二十萬中國臣民，他們的利益與我們密切相關。華人爲荷印政府的財政收入、工業、貿易的發展做出巨大的貢獻。〞1875年，施萊格得到了夢寐以求的教授職位，1882～1892年間，他編纂的《荷華文語類參》（荷漢辭典）四卷路續出版問世。這部巨著受到國外學者的極高評價，特別是因爲這本辭典中，可明瞭地查閱閩南話的語音。然而，令施萊格遺憾的是，這部辭典僅在荷屬東印度翻譯人員的有限範圍內中使用。

萊頓中文學校的課程設置主要是爲了研究荷屬東印度的華人和他們的祖居地中國南方，特別是福建省。施萊格接任教授時，宣稱以此爲已任。施萊格擔任教授期間(1875-1903)，共培養二十五名中文翻譯，他們的科研成果幾乎僅局限于南中國及其對東南亞擴張的研究。主要研究專題是：對華人移民相當重要的喪葬組織（這種組織對重視祖先崇拜的移民集團特別重要），秘密會社（對華人礦工特別重要）、勞動協會組織〝公司〞、華人移民社會的勞動狀況與權力關系等等。最后是關于華人風俗習慣（偏重于禮儀制度）的研究，施萊格最有才華的高足高羅特（J. J. M. de Groot, 一譯高延）對這個題目進行深入的探索。1903年施萊格去世，高羅特接任其教授職位。

⑮參照賴永祥〈學習當地語言的土方法〉，原載1988.7.3《台教會公報》1896期，收入賴（1990）P.65。

⑯參見賴永祥〈馬偕「中西字典」〉，賴（1990）P.67。

⑰參見賴永祥〈俗語字在甘字典〉，賴（1990）P.177。

⑱按沈富進1954年初版的《彙音寶鑑》，1984年 2月即印了第29版，顯然比甘典更受歡迎。

參考書目：

Douglas, Carstairs（杜嘉德）

1873"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廈英大辭典）London：Missionar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England.

Williams, S.W.（衛三畏）

1874"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 the Pronunciation of Peking, Canton, Amoy, Shanghai"（漢英韻府）上海長老教會出版。

Francken, J.J.C en De Grijs

1882"Chineesch-Hollandsch Woordenboek van het Emoi Dialect"（廈荷大辭典）1882, Bataviaasch Genootschap van kunsten en Wetenschapen（巴達維亞藝術與科學協會）出版。

Schlegel, Gustave

1882-1890 " Nederlandsch-Chineesch Woordenboek, met de Transcriptie der Chineesche Karakters in het Tsiang - tsiu Dialekt, Hoofdzakelijk ten behoeve de Tolken voor de Chineesche Taal in Nederfandsch-Indië "（荷華文語類參）Leiden:E.J. Brill出版

Macgowan, John（麥嘉湖）

1883"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Amoy Dialect"（英廈大辭典）London:Trüber & Co.

Mackay, George Leslie（偕叡理，通稱馬偕）

1891"Chinese Romanized Dictionary of the Formosan Vernacular"（中西字典）台北耶穌聖教會出版。

Talmage, John Van Nest

1894 "Ēmn̂g im e Jī- án"（廈門个字典）廈門鼓浪嶼：萃經堂出版。

William, Campbell（甘爲霖）

1913"A Dictionary of the Amoy Vernacular Spoken throughout the Prefectures of Chin- chiu, Chiang - chiu and Formosa（Taiwan）"（廈門音新字典）

Barclay, Tohmas（巴克禮）

1923"Supplement to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Amoy [Rev. Carstairs Douglas, M.A.LL.D]"（廈英大辭典補編）1923年，台南：英國長老教會出版

井川直衛編

1936《バアクレイ博士の面影》台南：基督教眞理社出版。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

1965《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出版。

吳守禮

1944〈台灣ロ－マ字ヒキリスト教〉《民族台灣》4.1

民國59年（1970）《台灣省通志卷二人民志語言篇》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村上嘉英
1966〈日本人の台灣における閩南語研究〉《日本文化》45：62-108。
1966〈プロテスタント宣教教の閩南語研究一異民族傳道と言語の問題〉《日本文化》44:52-72。
1971〈白話字の變遷と閩南語譯聖書〉《日本文化》49：96-118。
賴永祥
1990《教會史話》第一輯，人光出版社



巴克禮牧師遺像